

#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夏春涛

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深谋远虑，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总体部署，将我国法治推上一个新高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从本质上讲，我们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就会失去最根本的保证。从渊源上看，我们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倡议者、设计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这一顶层设计。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法治才得以不断向前推进。从内容上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党中央主持起草，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唯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制定这样一份代表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符合党和人民共同期盼、切合我国国情的重要文献。从具体实施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所提出的改革举措多达180多项，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依靠党来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筹协调，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没有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不能有序有效进行，其总目标就会落空。

说到底，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取得辉煌建设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君主专制历史的东方大国推进法治，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江西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权，就已对法治进行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随后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我国法治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吸取十年内乱的沉痛教训，不断推进法治，力度越来越大。经全国人大审议，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公布实施，后又四次进行必要修正，体现了与时俱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在认识上更加深化，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大提

应有内涵。一切与此相悖的言行，均属于违反宪法。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赖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全会主题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与三中全会有着紧密关联：依法治国涉及许多改革举措，从属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总体框架；全面深化改革，则需要以法治作为依托和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从法治角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在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末句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脚点放在了体系、能力的现代化上。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从法治角度讲，国家治理能力主要指党依法治国理政的能力，所谓现代化，主要指法治化。作出科学缜密的顶层设计不容易，落实到位更不容易。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决定》提出了“三统一”、“四善于”要求：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实现《决定》提出的总目标，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为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客观上也要求党更加注重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赖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大以来，为积极应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着力整顿“四风”，同时雷厉风行地打“虎”拍“蝇”，严惩腐败分子，在治标上收到显著成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治本之举，标志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迈入标本兼治阶段。依法治国主要取决于依法执政，依法执政之关键在于依宪执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严格划清公与私的界限，绝不允许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

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围绕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加大监督力度，《决定》提出了许多新举措新思路，诸如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探索建立纪检监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等等。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决定》强调“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并作了针对性部署，其要点包括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反对和克服“四风”的严密的长效机制；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上述举措，便于从根本上改变“牛栏关猫”现象，顺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势，彰显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理念，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总之，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助于我们党解决好党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 三、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推进法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关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相关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实际成效如何，关键在党。建设全民守法的法治社会，党员要走在前面。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在这一场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法治精神，带头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勇于担当，狠抓落实。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打破利益固化藩篱。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增强法治观念，努力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要恪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法律存敬畏之心，牢固树立底线意识，杜绝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 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 为APEC未来发展注入新活力

## 观点聚焦

提出，2014年APEC北京峰会，是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标志，也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

中国提出了“APEC模式”：承认多样性、灵活性、渐进性与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促进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在APEC框架内，中国通过多种多样的单边行动、集体行动、双边行动和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2014年中国北京举办APEC峰会，成为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一个标志。中国APEC战略调整表现为：中国从一个参与者向一个领导者转变；从被动性和应对性向主动性和引领性转变；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一言以概之，中国开始了APEC会议中的大国方略。而这一大国方略与中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紧密相连，全面改革的大国战略与全面开放的大国战略环环相扣，也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推动力。

## APEC迎来新转机新秩序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指出，北京峰会最务实的一项成绩，就是通过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这对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贡献。北京峰会达成的共识，使得21个成员都参与进来，这种平等、包容的理念，直接推动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为APEC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APEC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互联互通”理念的升级，是北京峰会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除APEC21个成员外，印度、蒙古等“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合作伙伴也在加强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共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正是互联互通。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亚洲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也反映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有意愿、有能力推动互联互通的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认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是亚太地区落实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抓手”。很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停留在口头、口号层面，实施起来不顺畅，就在于硬件、软件、民心上的互联互通做得不够，地区经济合作的毛细血管被堵住了。北京峰会抓住了问题症结，就是要疏通、打通长期困扰APEC经济合作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经络和毛细血管，让经济增长活络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APEC在复杂的成员构成前提下，推出自贸区谈判尝试，恰可以对正陷入改革困境的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产生示范效应，为APEC实现机制化提供了新转机。未来或许可以设置“三驾马车”，即前后三届峰会东道主协同办会，这有助于督促、落实已通过的声明、纲领，突破现有APEC论坛形式，进而推动形成有约束力的APEC机制。

## APEC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

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戴金平《人民论坛》刊文

## 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的伟大复兴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对地区事务参与度的加大，全球治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提出，中国在地区范围内推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是对地区治理，甚至全球治理的一个重大贡献。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信心和能力，再次彰显了中国不断提升的大国责任。然而，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一些西方国家却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看作对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对此，我们应该继续秉承传统文化理念，推进相关外交工作。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都不是为了取代、挑战现有地区和世界秩序。中国并非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也认为，新形势下，外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的国际事务管理职能只会增加不会缩小。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公共管理能力提升将为APEC机制化提供新的动力。未来或许可以设置“三驾马车”，即前两届峰会东道主协同办会，这有助于督促、落实已通过的声明、纲领，突破现有APEC论坛形式，进而推动形成有约束力的APEC机制。

(李伦)

## 本期特稿

建设法治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理念和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正确把握、深刻认识党和法治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 一、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有着根本区别。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90多年光辉岁月中，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目的都是为了人民：干革命，是为人民谋解放；搞建设、抓改革，是为人民谋幸福。旧中国一穷二白，满目疮痍。执政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6年来，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奋斗，闯过一道道难关，战胜无数风险挑战，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取得辉煌建设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君主专制历史的东方大国推进法治，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江西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权，就已对法治进行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随后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我国法治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吸取十年内乱的沉痛教训，不断推进法治，力度越来越大。经全国人大审议，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公布实施，后又四次进行必要修正，体现了与时俱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在认识上更加深化，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大提

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深谋远虑，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总体部署，将我国法治推上一个新高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从本质上讲，我们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就会失去最根本的保证。从渊源上看，我们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倡议者、设计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这一顶层设计。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法治才得以不断向前推进。从内容上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党中央主持起草，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唯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制定这样一份代表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符合党和人民共同期盼、切合我国国情的重要文献。从具体实施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所提出的改革举措多达180多项，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依靠党来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筹协调，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没有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不能有序有效进行，其总目标就会落空。

说到底，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取得辉煌建设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 二、党的领导必须依靠法治来加强和改善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来加强和改善。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深谋远虑，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总体部署，将我国法治推上一个新高度。

建设法治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理念和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正确把握、深刻认识党和法治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苦劳，尊重和善待苦劳者。

其次，苦劳不能等同于功劳。有了苦劳，就可以“邀功请赏”了吗？显然不能。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一次，一位跟随他多年征战的将军对他

说：“我应该升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因为我沉于战事，经验丰富，参加过十几次重要战役。”哈德良皇帝知道这位将军在这些重要战役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并不认为他有能力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哈德良皇帝指着拴在周围的战驴说：“亲爱的将军，您好好看看这些驴子，它们至少参加过20多次重要战役，可它们仍然是驴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 理论漫谈

功劳，语出《管子·明法解》。百度词条的解释，是指对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超越平凡的劳动。清《潜书·审知》对此有精辟论述：“功劳不可尽居，大名不可尽取，爵禄不可尽得。”苦劳，主要是指为事业所付出的艰苦劳动。明代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曾在《答织造许枢使书》中云：“官无私弊，民不苦劳。”意思是，为官者若无徇私舞弊，百姓就会少受一些折腾、少吃一些苦头。

### 功劳与苦劳

江海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总喜欢把这话挂在嘴边。这当中，不乏有自我安慰的“阿Q心理”，也有对现实处境不满的抱怨，甚至还夹杂着办砸事、做错事后的托词，等等。所以，有必要对功劳与苦劳这两者的关系作些理性的分析。

首先，功劳源于苦劳。有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经寒彻骨，哪来梅花香”。苦劳是功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苦劳，也就没有功劳。干事创业，要想取得预期的业绩和功劳，就必须舍得投入、敢于付出。成功的背后，必定凝聚着汗水、泪水和辛勤的劳动。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离开苦劳得来的功劳，不是投机取巧之“假功”，就有可能是弄虚作假之“虚功”。这种急功近利之“功”，有的时候经过一番包装和粉饰，或许也能糊弄上级、欺骗群众，但终究是经不起时间和实践检验。所以，我们都应该重视和提倡

## 实践与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江北区目前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50817人，占全区户籍人口总数的21.02%，人口在加速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而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缺钱、缺人、缺经验、缺体制的现状，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的难点。

近年来，江北区委区政府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放手培育涉老类投资、运营主体。同时，通过出台政策，优化环境，让他们可进入并放心经营，逐步形成了居家养老可帮助、社区服务可覆盖、机构养老可供选择、慈孝文化可传承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多元投资设施建设，机构养老可供选择  
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体系，必须妥善处理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强化了政府在规划统筹、政策扶持、市场培育、典型示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功能，维护养老服务事业的公益性。深入开展政策调研活动，从完善养老机构建设用地保障、健全养老服务资金补助、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与分析，完善了促进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让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能畅通无阻进入养老领域。如由深圳宁波商会会长黄伟民捐助

500万元建设的慈城步韬益寿院有床位200张，目前已开始收住寄养老人。该院采取所有权、经营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模式，通过公开招标专业机构入住，公益化为主导，市场化管理，颇受慈城镇及周边老人欢迎。由民营企业颐乐居(中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江北慈孝乐园项目占地120亩，建筑面积逾10万平方米，设计床位2000张，总投资约5亿元，现已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预计2015年底完工，届时可提供居家、助护、全护等养老服务。最近，上海复兴养老公司摘得宁波第九医院南侧43亩土地，用于开发医养结合的高端养老项目，规划建设1000张床位。这些项目建成后，江北区每百名老年人拥有机养老保险床位数可达到6张以上，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将高于40%，民办养老机构床位占比在90%以上，均高于省市规定要求。

多方参与项目优化，社区服务可覆盖

当前，社区服务发展总体仍属于政府推动型，社区养老服务更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这几年我们大力培育和引进民办非企业组织，鼓励他们参与和投资社区养老服务，使长期单一单调的社区养老服务发生着可喜的变化，正朝着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方向快速迈进，使老年人能便捷得到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如中马街道引进“仁爱华”养老服务品牌旗下的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江北区慈爱嘉养老助残服务指导中心，由专业团队提供日间陪护、家政服务、康复训练、就医陪同、家庭护理等服务项目，通过网络平台与社会企业携手，开展线上咨询与线下服务，使老年人住在家里，就可享受机构养老服务的各项服务，建立起“没有围墙的智慧养老院”。“恰如家”和“天伦之家”两大养老助残网络服务平台，促合网络平台与社会企业携手，开展线上咨询与线下服务，使老年人住在家里，就可享受机构养老服务的各项服务，建立起“没有围墙的智慧养老院”。“恰如家”和“天伦之家”养老助残平台由接待中心、呼叫中心和管理中心组成，以社区企业服务为依托，以热线和帮扶终端为纽带，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成了集生活帮助、主动关怀、紧急救助为一体的新型“智慧敬老院”，建成了包括家庭成员情况、个人病史、基本养老医疗保障、社会救助、养老补贴、养老需求等内容的老年信息库，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还与辖区20余家规模、信誉良好的商户签订了服务合同，联手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助、精神慰藉等多项准公益、专业化服务。今年，区政府将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列为

全区五大实事工程之一，全面推进软硬件升级。